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六一六 次会议

2002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塔夫罗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成员：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法国	莱维特先生
	几内亚	特拉奥雷先生
	爱尔兰	科尔先生
	毛里求斯	孔朱尔先生
	墨西哥	安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挪威	斯特罗门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新加坡	马布巴尼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迈克达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审议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 10 时 4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审议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草案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该报告草案由秘书处拟定。

安理会成员面前由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于 2002 年 8 月 9 日分发的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 2001 年 6 月 16 日至 2002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报告草案和一份更正。

我要感谢秘书处在编写这份实况报告时所做的工作。

由于本次会议没有发言者名单，我请愿发言的安理会成员从现在开始向秘书处作如此表示。

我现在请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作解释性发言。

卡洛莫先生（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向大会提交的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6 月 16 日至 2002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年度报告草案由秘书处按照安全理事会于 2002 年商定的修订格式拟定。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报告草案的格式以简洁的方式提供安全理事会活动指南。在这一方面，我要指出，这是根据文件 S/2002/199 所载的 2002 年 5 月 22 日安理会主席说明的规定而编写的第一份报告，这些规定旨在提高报告的质量，并且照顾到对先前格式表示的意见。

特别重要的是报告的引言部分，其中载有报告所述时期安理会工作的分析性概要。

2002 年 9 月 9 日，我以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的身份将报告草案分发给安全理事会现任成员和其任期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成员，供审议和评论。

一份载有一个安理会成员所要求的更动的更正也摆在安理会面前。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现阶段，我要感谢秘书处及时地编写了报告草案。

我现在要请那些愿就这份报告草案发表意见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巴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卡洛莫先生介绍该报告。我首先还要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会议是一次历史性会议。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成员第一次在将年度报告提交大会审议之前公开讨论该报告。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向大会提交该报告时也将提及本次会议的临时逐字记录。我希望，这将向在座的同事们解释为什么我可能必须作一个比通常稍微长一点的发言，因为如果不作发言，该发言将不会写进临时逐字记录中。

我们认为，年度报告的新格式实际上纠正了以前向大会提交安全理事会报告的方法中的一个缺陷，顺便提一下，这个缺陷在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著作”，即我们所知道的“贝利和道斯”出版物中提到。

贝利和道斯指出，

“目前形式的报告尽管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一次对安理会在过去 12 个月中的工作表示关切的机会，却几乎无助于提出这种关切。”（贝利和道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程序》，第三版第 290 页）

我希望我们已经处理该问题。

我们与各位同事都感到高兴的是，为该报告模式和内容的改进作出的微小的贡献。该报告的长度大幅度缩短，从 571 页缩短到近 291 页，正如卡洛莫先生所说，最后一分钟的更正得以删除大约 90 页。报告每删除 1 页节省大约 1 000 美元，所以我们今年在草拟该报告时节约了大约 30 万美元。

同时，已经提供了关于安全理事会审议和活动的更多统计情况。同样重要的是，该报告在导言中进行

了概括分析。我们不会谈到已经作出的改动的细节，相反我们在报告的案文中附上了一份解释说明，它阐明了新的形式中所作的所有改进。我们以为提供有关这些改动的公开记录将是有益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李玉金，你们知道他对该报告花了很大的力气，我还感谢你们很多同事和专家制定这一经修正的模式。

很多坐在外边的安理会观察员可能吃惊地看到，我们花时间来提供关于这些小的改动和改进的细节。我们应该解释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些创新。我们在任安理会理事国 21 个月之后，发现安全理事会是当今世界上最保守的机构之一，这或许有一些理由。在今年的大会中，秘书长将争取为大会——包括其附属机构——和秘书处注入改革的精神。

这种改革的精神尚未完全影响的安全理事会。我们注意到，安理会在机构的方法和程序方面尤其保守。例如，尽管我们努力推动安理会定期召开有关程序和工作方法的会议，然而在该报告所涉的时期仅召开六次这种工作会议。我们还试图使草拟决定公开会议发言者名单的名称的制度正式化。我们迄今未能成功。同样，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在 57 年后仍然是临时性的，这令人吃惊。同样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尽管安理会各种形式的会议泛滥，却没有就会议的名称和方法取得任何的协议。我在同安理会之外的同事谈过话后，可以说对于词汇的含义有相当大的混淆：公开会议；闭门会议；非公开的公开会议等等。我认为现在应当使这种名称标准化。

安全理事会对于成立有关程序和工作方法的工作小组犹豫不决，这令人感到不解，因为已经取得的改进，实际上是对安理会工作方法的相当大的改进。例如，安理会建立了同部队提供国的新的协商机制，并举行公开的总结会议，以便部队提供国和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能够以坦率和公开的方式同安理会理事国分享看法并互动。部队提供国赞赏这种改变。

已经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永久网址，从而非理事国能够更迅速地获得有关安全理事会

工作的信息。安理会还进行了更多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以听取包括学术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外部行动者的意见。去年，安理会的审议通过使用概括介绍、基于评估的报告以及公开会议中安理会与非理事的成员之间轮换的做法而更加高效和有效，以及更加互动和具分析性。

秘书处准备的报告中概述了很多这些事态发展，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 S/2002/603 散发，日期为 2002 年 6 月 6 日。我们极力向联合国成员国推荐该报告，因为它全面叙述了 2001 年在安全理事会的做法中的改变。我希望各会员国将在大会中就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的问题发言时参考该文件。

秘书长还在其关于“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 (A/57/387) 的报告中提到这些改进，该报告于 200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出炉，它已经向各区域集团提出。例如，他昨天向亚洲集团提交。他在报告中指出：

“在过去几年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已有显著改进——不设成员名额工作组周详的审议也部分地促成了这一结果。安理会的透明度更大，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加其工作。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参加的公开会议数目增加；向联合国更多会员国通报情况的次数增多；与部队派遣国进行协商的安排也有所改进。”
(A/57/387, 第 21 段)

所以，秘书长建议，作为其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安全理事会“不妨考虑将其最近在实践中的变化整理成文字。”(同上)

从报告的程序性创新转到报告的实质上来，我们应当承认，每年在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的辩论中一次又一次提出的主要批评，是该报告不具分析性，因此不能当作评估安理会工作的基础。

从理论上讲，大会成员的抱怨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在大会去年的辩论中发言时把报告的分析部分作为关键主题之一。然而，我们在任安理会理事国之

后，意识到大会成员可能对安理会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鉴于安理会的沉重工作负荷，以及安理会讨论的很多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和具有正义的性质，15个安理会理事国将需要数月的谈判来就对安理会工作的共同分析评估达成一致。

尽管如此，今年的年度报告作了简要的分析性概述，它由联合王国代表团在七月任主席期间巧妙地草拟。我们祝贺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和他的班子为草拟这一概述所作的工作。

我们还认为，安理会理事国单独在今天辩论中所作的评估和思考，为评估安理会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尽管安理会决策过程可能常常闭门进行，但安理会工作的结果现在更加清晰可见。它的建议、主席声明和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都是公开的文件。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的结果——现已达到近每年30亿美元——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大会开会时对于评估安理会的工作有足够的公开数据。

因此，我们建议大会成员的一种更建设性的做法，将是争取制定一套一致商定的标准，用来评估安理会的工作。一些所包含的问题可能如下：第一，安理会成功地掌握了它范围内的问题了吗；安理会的工作拯救和改善了生命了吗？第二，安理会改进其程序和工作方法以使其工作具有更大的效率和实效了吗？第三，安理会的工作以及同更广泛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关系更加透明和公开吗？第四，安理会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和名誉？

这些只是初步的建议。我们相信，各同事能够加以改进，很可能制定出更好的标准。

我们经过思考而认为，对今年的年度报告所涉时期安理会工作的任何客观评估，都应造成一种全面的积极评估。今年的情况不错。有很多成功的事例，无法一一列举，但应当举出几个以说明。

首先，对恐怖主义问题，安理会特别是通过其实质性建议、由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主持的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和巴尔迪维索大使主持的1267制裁委员会而对9月11日以后的恐怖主义威胁作出的反应，表明了安理会的真正价值。安全理事会赋予全球的反应合法性。它还为推动国际行动提供了必要的领导。如果安全理事会在2001年9月12日没有存在，当时便必须创建安理会。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再次表明安理会的不可或缺性。

第二，关于东帝汶，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的工作为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东帝汶将于明天被大会正式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安理会作出明智决定，建立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以替代东帝汶过渡当局，在其独立的头几年继续协助东帝汶维持安全与稳定并履行行政的核心职能；这反映了安理会致力于制订联合国明确和有信誉的撤出战略。

关于阿富汗，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大使协助指导波恩进程，并通过其对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有效领导，继续确保其执行。另外，昨天有人告诉我，如果在阿富汗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卜拉希米大使将很快当选总统。今天他是阿富汗内最受欢迎的人士。迄今为止，阿富汗在返回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已超越一切期望，虽然还存在着众多挑战。据我们所知，问题是安全局面仍然脆弱，但仍然存在强大的阻力，不愿考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地理扩大。安理会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关于塞拉利昂，在2002年5月14日举行了成功选举之后和塞拉利昂政府为执行恢复措施作出努力之后，使塞拉利昂恢复脆弱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了安理会的信誉并再次确认了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坦率地说，安理会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因此，它也有其成功和失败。某些方面显然需要更多关注。再次作为说明性而非全面的清单，我要举几个例子。

关于制裁问题的工作组原计划于2000年11月完成其工作。现在几乎两年之后，它仍陷于僵局。我们

希望安理会成员将支持贝林加-埃布图大使为重振这一工作组所做的努力。

中东危机近月来有所恶化。然而，安理会通过了第 1397 (2002) 号决议，这一里程碑性决议再次确认了这样一个设想，即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并存的地区。我们希望，四方这一新的外交手段将努力执行它。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安理会迄今为止尚未能够就 2002 年 4 月安全理事会大湖地区代表团提出的倡议作出果断决定。这可能影响安理会的信誉及其今后的使命。然而，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卢旺达和乌干达最近签署的协议，安理会现在得到新的机会，对秘书长有关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如何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各项建议作出积极回应。

索马里在挪威将其拾起之前，显然是安理会的战略孤儿之一，我希望这一说法不会被误解。安理会仍然需要制订一项全面政策，处理索马里问题的安全和人道主义方面。

在墨西哥的辛塞尔大使建议重新看待利比里亚问题之前，利比里亚也是安理会的战略孤儿之一。安理会显然需要一项全面和一贯的政策，保护其在西非的主要投资。

最后，与安理会的许多冲突档案的局势中产生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人士问题相关的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今天尚未得到安理会的充分解决。实际上，安理会需要同诸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局等其他有关联合国机构合作，建立一种一致和协调的方针。

这些清单都不全面。我们尚未提到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目前的热题伊拉克、西撒哈拉、格鲁吉亚、塞浦路斯、巴尔干等等。但在我们所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列举所有成功和不太成功的案例。然而，当大会举行会议审查今年年度报告时，我们希望他们将谈到由积极介入管理这些困难问题的安理会成员所做的评估。

最后，主席先生，我希望，你将允许我在结束发言时指出，安理会成员也就安理会如何能够在今后数年改进其工作提出建议是有益的作法。就我们而言，我们想至少在两个领域内提出建议。

第一，我认为安理会应该对秘书长所提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即我们应该“编纂”安理会所作改进。安理会的制度结构和安理会的工作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均有所增加。然而没有对安理会所开展活动的全面范围作任何充分的描述，这些活动现在包括公开会议、非公开会议、非正式磋商、同部队派遣国的会议、工作组、正式和非正式朋友小组、联络小组等等。现在是有人来勾划出整个安理会结构图案的时候了。一旦我们明确地划出大的画面，便比较容易审查安理会。

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还应积极回应秘书长的努力，使联合国大家庭充满改革的新精神。使安理会具有革新文化的一个办法是关于工作方法和程序的非正式工作组更加积极起来。安理会内每一个成员应该指派一名组织革新和改进方面的专家，安理会工作组应定期举行会议。但愿该工作组可以提出建议，改善工作方法、减少工作量、使安理会能够把时间集中在最需要关切的问题和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宪章》责任。

我们要提的第二项建议是，安理会应定期举行会议，对其工作进行战略审查。虽然安理会的工作量大幅增加——我认为报告中有所记载——但安理会尚未找到机会对其所有完成的工作进行战略性总结。没有为安理会的工作安排优先秩序作出有意识的努力。通常，是最紧迫的问题，而非最重要的问题得到最多关注。每年只有一次对安理会工作进行这种战略回顾的机会。它发生在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年度务虚会上。我们赞扬秘书长主持他的务虚会议，但或许更为有益的是找到其他场合来全面战略性地审查安理会工作。所有组织都感到这样做是健康的。安理会也应这样做。

安理会经常对其自己在特别是长期的案例上所采取的行动或经常是不采取行动进行深入审查和评估是有益的，这样可以使这些问题活跃起来。可能很容易指责有关对立方。安理会不应指责其他方面，而应问一下自己，这些局势为什么还没有改进？只是通过发表更多的新闻稿、主席声明和决议来作出回应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审查和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于满足保守和安全的立场，而没有去寻找替代和创新性解决办法。

如果习惯上安理会被看做为不能履行其在这些长期问题上的职责，安全理事会的信誉便会受到伤害。如果人们认为在安理会的意愿同其实际成就之间存在一种差距，那么其新闻发布稿、主席声明和决议便有可能受忽视。

最后，我希望能够如同 2001 年 10 月安理会在爱尔兰当主席时的情况那样，在大会下个月对年度报告进行辩论之后，安理会将讨论辩论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考虑所提的关键意见，以便考虑进一步改善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工作和今后的报告。去年，新加坡提出在一般性辩论中所做的关键问题的简短总结，已促进这样一次讨论。今年我们愿意再这样做。安理会讨论大会上提出的问题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关系。

最后一点，我对宣读冗长的发言表示歉意，但如果我不宣读，它不会出现在临时逐字记录中，因此它便不会印发。我这样做了要向我的全体同事们表示歉意。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是想宣读一份发言，但是，我认为在马布巴尼大使的长篇发言之后，我还是在自发讨论中讲几句话，所冒的风险不过是在发言的逐字记录中并非逐字斟酌过而已。

纪梭·马布巴尼最后的评论很有意思。它最后实际上是一项建议。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进行活跃辩论的话，必须保证象马布巴尼大使刚刚宣读的稿件能在不事先宣读的情况下载入逐字记录。这样，我们才能够

进行我现在将要开始的对话。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又一项改革。

我想首先向马布巴马大使、克里斯蒂娜·李和整个新加坡工作班子为修改年度报告表现出的不平凡决心表示欢迎。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却绝对必要的任务。我们面前不再是用不得的一本汇编，而是使任何人能够找到我们工作在既定年份记录的一份报告。我们不仅为联合国节省了费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为所有会员国提供了一个真正有用的工具；节约本身是一件好事，实际上我们恐怕还要决定如何处理这笔节约下来的钱。

同我们的朋友纪梭一样，我也要向格林斯托克大使表示祝贺。因为我认为开场发言是分析部分的开始。安全理事会是一支缓慢演变的动物，我想格林斯托克大使举的例子是分析部分的良好开端，这部分会逐渐地被写入年度报告的开始部分。

在我的有关年度报告的见解之外，我认为今天的讨论是再一次就我们工作方法进行反思的机会。同去年大会他的发言相比较，我在听马布巴尼大使发言时得到的最深印象是他所认为的我们已经取得许多成就。我想这是准确的判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自从 50 多年前创建以来工作方法的演变的话，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已经从冬眠时期过渡到迅速发展的阶段。有些人可能说进步还不够快。但是我对安全理事会能够以切实方式完善其工作方法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将安理会同大会相比较，可以说在这场友好竞争中，安理会跑在了前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每月的工作方案是如何决定和筹划的，在看到我们为自己制订的目标并考虑到一些人喜爱而别一些人持批评态度的总结会议时，我们能够指出在组织方面，我们正取得进步，并同时保留我们工作中的必要灵活性，它是由不断变化的事件所决定的。

马布巴尼大使谈到透明度。的确，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召开过如此多的公开会议。我们打破了所有记录。他正确地提到我们通过阿里亚方式会议向民间社会所表现的公开性，这种办法使我们

同非政府组织代表接触，他们丰富了我们的工作并改变了安理会的形象，他们表现出能够倾听除固定数目的国家之外所有那些能够作出有益贡献的国家的发言。

在对民间社会公开的那些会议之外，我们同其他成员国合作的能力也得到改善。格林斯托克大使再次值得称赞，这次是他担任反对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当我们担负主持委员会或工作组工作的责任时，他的行动为我们所有人应做的树立了样板。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特设工作组也是一个我们应当更加加以利用的非常好的工具。

我想补充最后一点。在安理厅以外，安全理事会出使各国对我们来讲已经成为同有关各国和地区及次区域组织进行更好合作的绝对不可少的因素，我想这对我们所走访的各地区伙伴也是一样。

这些事例都说明我们的确能够演变。

马布巴尼大使谈到我们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功和挫折。我想提及他谈到的一个问题：制裁。两年来我们曾努力取得一致并通过一份文件，这是事实。我们陷于僵局。然而，我们能指出在十年制裁之后，我们能够完善一个除言词、声明、决议和使用武力以外由我们支配的工具。今天，制裁是更加精密和目标更明确的工具。我们引进了时间限制的概念。我认为这是一大进展，即便安理厅会议席在座的有些人不同意这样讲。我们也已经开始对人道后果的关注。我认为这是除其他方面外两个取得进展的领域，它们说明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够朝正确方向发展。

我在结束时想就马布巴尼大使所提建议提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把所有这些都编排号码？我冒着使我的同行感到惊讶的风险指出，我高兴地站在英国人的务实作风一边。在法国，我们象着魔似的为所有事情编排以数码，从我们宪法开始就这样。经验表明现在，并且正以更快的步伐我们在改变宪法，因为世界发生着非常快的变化。至于英国人，他们没有成文的宪法，但他们也过的挺好。我想我们大概应当在我们

的工作方法中遵循英国人的智慧和务实精神。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事情。我相信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完成此事。让我们继续这方面的努力，同时，不要过多地陷于数码。

斯特勒曼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主席，允许我祝贺你召集这些关于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年度报告的会议。挪威继续高度重视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透明度问题。同本组织更广大成员就安理会面临的问题充分交换情况和看法是，安理会执行其授权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这方面，我也要向新加坡代表团表示敬意，他们为加强包括年度报告在内的安理会工作的技术方面作出努力。挪威完全支持已经提出的报告草案。

更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是各成员手中的政治工具，目的是解决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的冲突。这也意味着安理会的工作方法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为适合当前挑战的创造性途径提供便利。

安理会在过去一年处理了大量问题。公开会议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用作就这些问题交换信息和看法的手段。然而，挪威继续认为并且主张应当将秘书处起草的通报和材料的更大比例直接提供给更广泛的会员国。

挪威政府对安理会议程上各个问题的立场已通过我们早些时候的专门审议而众所周知。我今天不愿在此花费我们宝贵时间重复这些立场，但我要集中谈一谈安理会通过使用其拥有的三个具体机制采取重要步骤的各方面问题。

第一，为了同部队派遣国进行合作，安理会根据第 1353（2001）号决议，在按任务规定进行审议前定期召开了协商会议。重要的是，部队派遣国承担了同联合国行动有关的政治和人员风险，因此安理会必须充分征求它们的意见。这必须包括在系统内制定计划和提议阶段进行早期磋商。为此，安理会今年 1 月为进行此类更加非正式的磋商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作为该机构主席，我鼓励所有主要部队派遣国充分利用

这个工具同安理会成员和秘书处接触。重要的是，这个新机构使部队派遣国得以自行酌情提出新出现的问题。我们看到 8 月份在利用该机构处理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问题时，这个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二，安理会 2002 年曾两次访问非洲冲突地区或刚摆脱冲突的地区。2 月份，安理会全体成员在科尔比大使领导下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和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举行了会议。这几次会议是在即将根据《阿尔及尔协定》作出边界决定前夕召开的。这项边界决定最后得到双方认可，目前正在同联合国密切合作下加以执行。5 月份安理会全体成员在莱维特大使领导下同大湖区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以便促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和平。

最近，我们看到其中若干有关方面已根据安理会给予的鼓励朝着正确方向采取了步骤，安理会仍在积极处理这些问题。派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以及大湖区表明，安理会代表团是接触冲突各方的有益工具。基于这些有益的经验，我们完全支持安理会代表团概念。同时，认识到一些安理会非成员对费用问题提出的关切，我们赞成把此类代表团规模缩小到一个由大约 6 至 8 名成员组成的代表核心小组。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安理会曾在今年 7 月批准建立一个专家小组，以便提供有关违反索马里武器禁运的情况，以期改进其执行情况。专家小组可在某些情况下提供独立和具有权威性的情况，提醒国际社会警惕破坏谋求和平的各种活动。因此，该小组会在迫使行动者为其违反和平目标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挪威一直设法通过其安理会成员资格，提请安理会注意索马里问题。该国已 10 多年没有中央政府了，安理会 1992 年建立的武器禁运也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因此安理会早就该采取今年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必须进一步得到加强，以便恢复联合国在这个饱受战祸国家问题上的信誉。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10 月 15 日通过肯尼亚提供便利召开的会议，一直为给索马里带来和平与秩序而不断努力，这种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支持。重要的是，联合国必须随时准备发挥其作用，充分和积极协助索马里恢复正常状态。挪威将继续对索马里问题作出积极贡献，以此作为全面重视非洲问题的一部分。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卡洛莫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发言。

我认为，我们今年的报告同前几年相比确实很令人感兴趣，我也要同莱威特大使和其他各位一起恰当地赞扬以马布巴尼大使、李部长和新加坡工作人员不仅促使我们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也如何为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主要实质性内容。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做法，我对马布巴尼大使的领导方式感到敬佩。我过一会儿将谈及他发言的一些内容，因为我同让-达维德·莱维特一起热切希望本次会议进行互动讨论，我将就此表达几点意见。

从许多方面看，今年对安理会来说不同凡响。当然，9 月 11 日确定了基调，阿富汗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但我在出席安理会几年后感到，我们在几个方面确实开始朝正确方向迈进。我们去年几乎也是空前地忙碌。公开会议数目的上一个记录是 2001 年 11 月在牙买加担任主席时创造的。联合王国出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在 7 月份打破了这个记录，我们召开了 29 次公开会议。毫无疑问，这个记录今后不久很快就会被打破，但世界的性质、全球化和安理会至少取得的一些不全面的成功都给安理会提出了种种要求，我认为人们应该谈及这些要求的密集程度。

然而，光数量本身显然是不够的，我只要谈一谈其他两方面问题：即安理会工作的质量和透明度。质量将附加一些主观的判断，但我要首先谈一谈安理会的性质及其在处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人员和机构中的位置。我们负有主要责任，但让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只有每个会员国都承担其自己的责任，本组织联合国才能最好地运作——而且它确实只有这样才行得通。这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论坛，安全理事会也是在任何时候由 15 个国家组

成的，它根据各国的指示工作，在这些情况下，它如果不进行大量协调与合作，就不能靠自己妥善处理任何问题。

我认为，去年阿富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我们联合国能够特别因可以利用拉赫达尔·卜拉希米等个人的杰出外交技巧而创造在阿富汗妥善工作的框架。但是，联合国本身，当然还有安全理事会本身无法产生完成这项工作手段。因此，有必要——显然在解决阿富汗安全问题方面从美国的权力和能量中、显然从各人道主义机构从事的大量工作中、并显然从有能力出资并决心确保阿富汗工作顺利 的会员国为一切工作提供的资金中——得到一些其他的力量源泉。但安全理事会的协调活动以及它赋予所有这些工作的合法性和框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适当评价。

非洲仍是我们必须在更加复杂环境中从事大部分工作的地区，我认为我们目前也在学习如何取得成效，特别是向那些也必须促使非洲成功实现更大和平与繁荣的人施加影响力。

我认为，在经过 1999 和 2000 年的不幸的经历之后，扭转塞拉利昂局势并看到在去年进行选举使安全理事会感到特别满意。但是，安全理事会这样做时必须得到在那里的现场的维持和平人员、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领导、塞拉利昂政府本身、特别想要作出自己贡献的国家和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各基金、机构和在现场进行协调的方案的巨大贡献，尤其是 2000 年 10 月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咨询。这是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利用其他工具并发挥协调、监督和推动作用的另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无法把事情做好。在中东，由于政治的对立我们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尽管安全理事会始终在这些领域中尽力而为，必须牢记，除了安全理事会之外，涉及一场危机或其他局势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可发挥自己的作用，理解联合国工作的集体性。各国不能在现代世界上发挥单方面作用，但是，它们发挥的作用必须加强联合国的集体目标。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局势中成员国不这样做，安全理事会就受到限制。

我想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过去两三年中取得了进展，安理会中的协商一致的习惯在实际上有了增长。我们几乎全部是以 15 票对 0 票通过我们的所有决议。我们都知道这增加了安理会工作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学会做的一件事和我们应当尽可能在每一个任务中都坚持的作法。有关伊拉克问题的第 1352（2001）号和第 1382（2001）号决议就是这种例子。如果我们能够继续这样做将是很好的。在其他一些领域中也是这样做了，尤其是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第 1397（2002）号决议，我们应当从该决议中吸取教训，看看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在最为复杂的局势中进行工作。但是，我们将不会始终能够掌握好所有局势。

我同意莱维特大使的意见，即我们的任务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赞扬他本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上的工作，他在三年中每年一次进入那个特别困难的地区——在这方面我们将怀念他。

但是，我们亲自访问现场各方的办公室并向它们表明我们决心要求它们执行它们自愿签署的协定时，我们就会产生作用。这就是安理会作为一个集体机构同会员国单独责任之间的交往的又一个例子。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安全理事会被阻止介入一些重大领域。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严重的危机——具有国际性质的各国内部的危机，和有着巨大冲突危险的国家之间的危机——这些危机没有提交到安理会。我想不出任何这种危机因为没有提交给安理会而获得的好处。当然，有些问题安理会无法解决；但是我并不相信避开安理会在实际上是一种正确的方法。

关于透明度，我赞同法国和挪威以及当然还有新加坡的意见：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努力。我并不在乎我们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是公开举行，除非当我们在就根本不能公开的文字或问题进行密切谈判。但是，我认为，透明度有助于为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工作的安全理事会的集体行动，并且如果说反恐委员会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某些进展，这只是因为我感到会员国非常愿意对履行第 1373（2001）号决议的运用作出响应。关

于这一透明度，我要归功于成员国在透明的气氛中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反恐委员会内部的任何新的倡议。这有助于我们在委员会中团结起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帮助联合国成员国在过去一年中也许是安全理事会最重要的新倡议上团结在一起。

我期待着在大会内进行令人感兴趣或交互性的辩论。我想这就是本报告的目的——要在大会中进行一次良好的辩论。当然，非安理会成员希望的话可以对安理会提出批评，但是，我希望他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在每次冲突范围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希望它们将有助于安理会继续取得进步，提出建设性以及批评性的意见。

我要在马布巴尼大使发言的第9段中的4个问题之上再加上1个问题。安理会是否充分满足了全球化进程对其提出的更大的要求？我想我们必须承认，正如他在发言中所说，世界变化的速度要大于安理会的速度——莱维特大使提到了这一点。安理会正在迎头赶上，但是，为了不要落在世界的后头，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

至于他在结论中建议的具体的改进，是的，我同意这些改进意见。但是，我不知道有关程序工作的非正式工作组是否恰当。安理会的各位大使应当利用各自的职权和权利发挥影响，使安理会能够产生结果。如果法国大使建议英国人的务实精神，我不可能建议这不是我们前进的方法。我相信，他谈到了这方面的正确的一点：我们不需要实行机构化，我们需要取得实际结果。我想我们正在表明如何能够这样做，我当然将尽我所能遵守马布巴尼和新加坡精神，并取得这些结果。

王英凡先生（中国）：今年安理会向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采用了新的模式，突出了重点，也简化了篇幅，节省了开支。这符合广大会员国的要求和愿望，也是安理会成员合作和努力的结果。其中新加坡起了领导的作用，秘书处也为此作出了贡献。

一年以来，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也有了改进，增加了透明度，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在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和尽可能争取达成一致已经日益成为各方的共识，我们希望这个积极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机构，应该说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注意了及时审议重大问题并迅速采取行动。

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安理会很快通过第1373（2001）号决议，并成立反恐委员会，为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协调作用。在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安理会能够团结一致，果断决策，为推动全面落实《波恩协议》，清除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挥了主要作用。安理会还重点审议了刚果（金）、安哥拉、塞拉利昂等许多非洲热点问题，并适时派团实地了解有关冲突的具体情况。

在安理会的推动和有关各方的努力下，非洲大陆一些冲突已先后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但安理会的工作离非洲国家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安理会应抓住时机进一步努力，并积极支持非盟等区域组织的工作，使非洲冲突的解决继续取得实际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安理会在中东/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还不如人意。尽管安理会先后通过了一些决议和声明，但中东局势仍未见好转。此外，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也令人担心，怎样切实帮助阿富汗临时政府改善阿富汗全境内的安全状况，为阿富汗重建创造有利条件，仍是安理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总而言之，安理会在面临重大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时怎样及时有效地发挥《宪章》所赋予的责任和作用，仍是对它的严峻挑战，也存在不少障碍和现实的问题，值得安理会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科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安排今天的安理会公开会议，审议给大会的年度报告。我还同其他人一样，热烈赞扬马布巴尼大使、李部长和新加坡代表团的其他人，赞扬他们为起草本报告所做的工作，如马布巴尼大使所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会员国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出的意见，即简化报告的篇幅，增强分析性，加大反思的力度。新加坡是使安理会工作更加透明、更加开

放和增强反思的重要进程的有力支持者。从本报告看来，我们已朝着这个方向迈出重要步骤，对此我们非常赞赏。

我想谈几点一般性看法，其中一些反映了已经提出的意见，涉及安理会的工作及安理会如何运作，以及涉及关于去年工作的报告所处理的安理会议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安全理事会理所当然处于多边体系和国际合作的核心。它在国际法中享有独特的合法性和权威。它处理多方面问题；如同已说过的那样，每月的议程常常可以恰当地延伸。不可避免的是，时间压力和各种事件非常迫人，并不总是允许我们如愿地对问题之间的联系、重点专题和我们所采取行动的一致性进行反思。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等人所指出，衡量标准不一定是我们召开多少次会议，而是我们在实现安理会的宗旨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在安理会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即保障和促进和平与预防冲突的任务。

我们必须始终彻底弄清楚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斯特罗门大使所指出，是处理赋予我们的任务，其实质是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不是唯一，而是主要——作用。马布巴尼大使表示，在某种意义上，安理会可能是世界上比较保守的机构之一。但在保证这种《宪章》责任和任务时，安理会保守一点肯定是对的。在接受为这种英国式实用主义概念的同时，如一位英国哲学家所说，我们不能太多地将有些事情曝光，有时必须在所有安理会成员之间对这些事情进行非常复杂的谈判和评估。

在信奉实力和资本的世界与多边作出决策和承担责任的手段之间总有交汇点。情况正是这样。安理会有 15 个成员，每个成员都提出自己的判断和观点。但在工作中，将安理会团结起来并作为其核心主题——爱尔兰在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对此感受颇深——是安理会成员有一种意识，即它们也都必须服从甚至在近 60 年之后仍然非常重要的一种理想——正如莱维特大使所说。各国为保障和平、预防战争、应对危机和冲突后重建进行合作，对于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是不可缺少的。

以赛亚·伯林为其一本书取名为“人类的不和谐音”，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生活和政治乱七八糟；安理会处理的许多危机既复杂又困难。危机可能是武力泛滥；冲突开始时发自内心深处的情绪是不容易压下去的。因此，安理会在其议程所列问题中所对付的世界本身在许多方面就是乱七八糟的。它们极其复杂，从 A 到 Z 很少有一条直线。因此，安理会必须利用自己的最佳判断，对形势作出恰当的估计，推进其目标并为此进行适当的监测。

关于安理会的程序，我想谈几点一般性看法。我认为安理会在承认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不要蚕食其他联合国机构或其作用，这点非常重要。这是过去几年来在对安理会报告进行一般性辩论时出现的一个主题。由许多机构和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国机制必须受到尊重，有时人们有一种感觉，安理会在恰当地辩论和评估专题问题时，需要当心不要贬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作用，它们的特权应得到充分尊重。

在政府间级别，显然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相互讨论，如我们去年在大会辩论时所指出。联合国各机构也需要就安理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基金和方案等所做的事情进行更多的相互讨论。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跟踪安理会的决议及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在安理会设立更多委员会。在孔朱尔大使任主席的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我们就有一个工作出色的委员会的范例。看一下在其他领域，审议特殊专题或地区问题的委员会是否也许能够跟踪这些问题，这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创新。这肯定是一项创新，我们认为值得考虑。

关于安理会特派团，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手段。已有派往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特派团，由科尔比大使领导，有派往大湖区的特派团，由莱维特大使任主席。我们将有可能派遣小规模的特派团，看看小规模特派团的长处。但是总有人对人数感到紧张——较小规模的小组的代表性如何。因此我们将看到也许由一名、三名或四名安理会成员组成一个特定的特派团这一想法的价值。我认为，从后勤方面

来讲，它也使我们能够更经常和更有价值的利用这个工具。

关于主题和总结辩论问题，我们认为，它是安理会最近时期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新做法。总结辩论不一定每个月举行，但我们无疑赞同象在新加坡担任主席期间所实行的那样，将其对非安理会成员国开放，使其能够发言——也许象我们所同意的那样每人，包括安理会成员发言时间限于3分钟。但是，我们认为那样做极其成功，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当然，9.11事件使人们减少了对安理会在一年期间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安理会果断和决定性的采取了行动。第1373(2001)号决议为反恐斗争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整体框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工作极其有效，我与其他人一道向格林斯托克大使表示敬意，他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社会解释和概述了委员会的目标。他在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中进行了极其出色的工作，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所采取的开放做法。

在阿富汗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其中包括波恩协定、卜拉希米先生和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的工作，以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作用。现在重要的是在重建过程中支持阿富汗人民，以便充分利用阿富汗人民在遭受苦难多年之后所获得的机会。

这不是一个需要强调的小问题。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的工作中必须表现出有效性。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安理会将有必要保持它在阿富汗的活动。

在中东问题上，就安理会的工作而言，我们在一年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在3月通过的第1397(2002)号决议确认了两个国家，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毗邻共存的设想。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现在重要的是加倍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赞赏以下事实：安理会现在每个月都有关于中东问题的情况通报。这是对安理会有关中东的工作的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贡献。

在非洲问题上，显然，如果“我们是一个社区”这句话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必须体现在非洲。非洲问题特设小组的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认真地处理了与大湖区、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马诺河联盟区域、布隆迪、索马里和安哥拉有关的问题。

这方面的核心之点是，随着非洲联盟的成立，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发展，现在有了促进非洲利益和支持非洲的真正前景。但象姆贝基总统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这将要求国际社会大量参与支持非洲的努力。安理会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适当注意并在今后作出很大承诺。

最后，因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时刻，所以让我感谢秘书处在这一年中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一切承诺和支持，我国代表团对此非常感谢。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同意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的以下看法：这一年对安理会来说是非凡的一年。今年仍然有几个月，然而，在这几个月中我们可能遇到本安理会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因此，向大会提交的这个报告是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提交的，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考查安理会，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舆论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安理会。

因此，我们感到满意的是，本报告是在安理会中同意改进其情况介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报告首次包括一项分析性内容，它集中涉及安理会活动中那些全体会员国关心的领域。

我们象安理会一些成员一样对纪梭、马布巴尼大使、李部长及其工作队所作的贡献表示祝贺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有用的工具，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就安理会在一年期间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中所进行的活动提出报告。

经过紧张的审议工作通过了编制这份报告的标准。我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审议工作，并同意马布巴

尼大使的设想和做法以及他的编制一份对国际社会真正有用的实质性文件的愿望。

我们祝贺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为编写序言所作的贡献，在成员之间就这个序言进行了活跃的讨论，序言包括在这份报告中；事实上，它是报告中的最重要创新做法。象莱维特大使——他是这个新做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安理会的工作是稳步进行的。这无疑是一个胜利。但是，讨论仍然在进行，尚未在安理会的所有成员中达成一致意见。一些成员仍然不愿意在编制报告的进程中开辟的道路上取得进展。

今天，我们可以认为稳步进行是一个胜利；然而，必须取得更多的胜利。我国代表团对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尚未感到满意。墨西哥希望，今后的新发展，特别是在分析性内容方面可以包括采用衡量安理会工作进展的明确和精确的指标，以及包括一个载有改善本组织工作程序和效绩的建设的章节。

墨西哥非常感兴趣的注视着安理会的工作，以及为使其成为一个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有更密切联系的机构而作出的努力。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当选成员，我们仅在较短的时期中在安理会中任职。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关键原因，我们希望以马布巴尼大使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作出特殊和非凡的努力，以确保在我们离开安全理事会时，我们已经作出了贡献，使安理会更接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其工作程序将远比现在更有透明度；以及已经在建立旨在使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决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所作的决定之间产生联系的机制方面取得了进展。

这方面我们认为，每月一次的总结会，为安理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讨论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将继续支持把这种作法固定下来。但是，仍有成员国保留，必须认真、尊重地考虑他们的意见，以便能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协议。

已经通过了措施，以改善整个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程序。其中有的非常简单，如在我们讨论时为非成员

国分派位置。其他则比较重要，如公开发表秘书长的报告和议程，以及有关安理会所讨论项目情况介绍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鉴于我们所了解情况，我们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秘书处成员，他们乐意接受在这里讨论和提出的措施，以期逐步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更加透明，同联合国其他成员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仍然乐意接受这些意见，而且为执行我们已通过的措施提供便利。在印发文件上，他们已积极响应。在安理会工作方面，我们还努力加强秘书处的工作，如安全理事会全体外派代表团和各制裁委员会，我国都积极参加。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越来越多举行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参加的会议的趋势。我们重申，我们必须执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48 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了举行开放的公开会议的做法。我们希望，安理会有些成员国对变革的抵制能减轻，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大会会员国之间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我们应在非正式工作组中继续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同样，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另一个领域，争取把我们的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制度化。具有讽刺意义的事，50 多年了，安理会用的仍然是暂行议事规则。

墨西哥对透明度原则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排除障碍，写出一份更加富有实质性内容的报告，反映安理会的日常工作。我们希望这一努力能成功。这是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决心完成的一项任务。

特拉奥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卡洛莫助理秘书长的介绍。我也要感谢马布巴尼大使及其同事所作的努力，争取改善安理会的工作方式，以及他所作的完整和非常有意义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欢迎召开今天的会议，专题初步审议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第 57 届会议的报告草案。这项可喜的行动反映了安理会改革安理会工作方式和进一步加强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用的决心。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草案，反映了我们评估我们在2001年6月16日至2002年7月31日期间所开展的活动并从中汲取教训的共同意愿，以期改进我们今后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首先从格式和内容来看，这份草案都有明显改进。事实上，我们这次避免简单地罗列和从数量上描述我们的活动，而提出了一份更富有分析性的概要文件，汲取了会员国多次向我们提出的基本意见。报告草案内容也更加简明扼要，在联合国其他机构已经处理的项目问题上，避免了重叠和重复。

关于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报告草案序言部分不是简单地陈述，而提出了生动和朝前看的分析。报告草案也涉及大问题，如我们的反恐怖主义的运动、制裁体制，以及同样重要的专题项目。

在审查期间，由于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贡献，不可否认，安全理事会已在改进安理会工作方式方面取得了可观进展。安理会还在根本上改变了它同其他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组织交流的方式，扩大安理会活动的范畴。这反映在，除其他外，更多地举行公开会议和“阿里亚办法”会议，以及每月举行总结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对话，争取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大的开放。

我们不能不提安理会派代表团访问非洲冲突地区；这样做已证实非常有用。而且，我们欢迎有关安理会各工作组和制裁委员会工作的定期报告。我们还应该提出安理会成员和部队派遣国之间加强磋商，评估维持和平行动。这使得我们能够增加交流，进而避免作出可能危害适当开展这种行动的决定。

但是，这些重要进展不应使我们忘记我们为实现我们的目标应该做的努力。这方面，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我们的工作，以期满足与我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有关的各项要求。在这些目标中的，我们特别重视提高对其他会员国的开放度、与联合国系统内和其他机构中的各种不同作用者更好地协调，以及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效，更富有效益。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考虑以最适当的方式确保有效和充分执行我们一起作出的许多决

议、决定和建议。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显示出更多的承诺、决心和集体意愿，这些目标决不是乌托邦，而且是的确可以实现的。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这表明安理会对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所给予的额外重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安理会成员为改进报告格式以及使报告更具价值所作的努力将受到联合国大会所有会员国的赞扬。

叙利亚支持本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我们感谢卡洛莫先生及其秘书处班子的所有成员为编写报告草案所作的努力。安理会成员本着一种积极的精神审查了变更格式及其分析性导言的重要性，这反映大家对如何尽可能从本报告更多受益表示出了兴趣。要谈论报告的新格式和安理会在这一方面通过的有关决议就必须感谢马布巴尼大使及其代表团成员，尤其是李玉金女士所作的巨大努力，他们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提供了协助，并坚持受到安理会成员肯定并相应地反应在这一新报告之中的想法。

许多发言者谈论了安理会在某些具体领域的工作，诸如在解决非洲、中东、亚洲的冲突或其他区域的冲突方面的工作。发言者还谈到了安全理事会派往许多冲突地区的特派团，并详细谈到了这些特派团的重要性及其前景。发言者还提及了安理会过去数月内召开的许多安理会总结会。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感谢莱维特大使所作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种我们开展工作的绝好规则，这一规则受到了我们大家的赞扬。我国代表团强调指出，鉴于安理会许多成员的所作的发言，维持这些总结会是非常必要和适宜的。

此外，在该报告审议期间，安理会审查了许多决议草案，以及维持和平、妇女和儿童、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问题的业务内容。的确，安理会在处理许多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和相当大成绩，尤其是在反恐怖主义领域。我与其他许多发言者一样感谢格林斯托克大使在这一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

但我们必须指出，在同一期间，安理会未能后续落实和执行其许多决议。与我们在安理会一起就非洲和世界其他区域问题进行讨论的许多代表团对这些决议未获执行表示了遗憾。当然，当我们重申安理会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许多决议时，这一话题变得更为敏感。我们认为，在执行这些决议方面缺乏后续行动将影响各国对安理会的看法及其信誉。我们在发言中已经一再提到这一点。

在此我将不深究这一问题。我要引述几天前通过的一项决议，即第 1435 (2002) 号决议。尽管安理会所有成员要求执行该决议，直接相关方却拒绝并藐视这一决议。

是的，安理会在执行其许多决议方面，诸如在使其工作更具有透明度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与过去几年相比，它举行的会议数创了记录。更重要的是，这些会议中有许多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以便它们表明自己的看法，并就安理会如何行使职能及提交其审议的议题发表意见。叙利亚认为，这些做法应予保持，以便安理会更为了解国际议程上正在讨论的所有问题，更为了解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看法。

马布巴尼大使曾经评论说，在安理会的工作方面，为使其更具效率和透明度已经讨论了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他也提到了制约我们工作的若干消极方面。我们确实同意他就这些方面的以往状况和未来将会出现的情况所作的分析。

叙利亚期待开展更多的严肃工作以改进安理会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问题工作组。这一做法应继续保持下去，因为筹划改进工作应随时不断地进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做法已经成为每次大会讨论该报告时所有会员国的迫切需求时，其意义将更为重大。

叙利亚期待在大会中就这一报告草案进行严肃地辩论，而且我们申明，我们将考虑可能改进安理会工作的所有建设性看法，从而使其更符合《宪章》的规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期望和要求。

孔朱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今天举行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将提交大会审查。我们感谢新加坡常驻代表马布巴尼大使及其副职李玉金女士为使今年的报告达到现有水平所作的不懈努力。马布巴尼大使的坚定决心及其基于现代商业做法的创新性办法——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办法有些傲慢——使我们今天产生了一份报告，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都会为此感到自豪。

安全理事会关于安理会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开展了杰出的工作，我们要感谢秘书处及其小组，感谢他们为编制这份出色的报告所作的一流工作，感谢他们对安理会的宝贵支持。

我们也希望对在 2001 年 12 月留在安理会的五位当选成员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希望能够向他们发出邀请，以使他们在今天的会议上就报告发表意见，因为他们也参与了我们的报告期间前六个月的工作。

与去年的报告相比，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有了重大的改进。它更加简短，可读性强，重点突出而且编排得体。更重要的是，在出版费用方面，它比先前的报告有了大幅度的节省。

关于报告的实质性内容，请允许我分两部分就报告发表意见，首先是关于安理会工作的程序性问题，其次是报告所涉及的安理会在去年所参与的实质性问题。

在 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期间，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有了显著改进。

第一，举行了更多次的有非安理会成员更广泛参与的公开会议，这使得安理会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第二，安理会在非正式磋商之后举行了大量公开的简报会，从而使非安理会成员有机会评估正在讨论或辩论的专题的最新事态发展。第三，举行

了若干次概述会议，以使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有机会以更坦率、公开的方式，就其感兴趣的专题表达各自的见解。

第四，通过对安理会辩论进行干预，成员和非成员交替发言，促成了更大程度的相互作用。第五，安理会开始采取了一项抽签决定发言人名单的新办法，这有助于使发言人名单制度更加公正和透明。

第六，在安全理事会内外举行了一系列集思广益会议，这有助于为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制定全面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安理会尽管议事日程很忙，但这或多或少是例行程序，应该找出更多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坦率、公开的意见交流，这样安理会就能为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制定战略方针。

这些程序上的改革极具有建设性意义。我们看到了一个能自由交流思想的更具有活力的安理会，可以就许多问题进行相互启发式的热烈讨论。值得列举的例子有：2002年1月在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担任主席职务时就非洲问题进行的讨论；在阿莫斯女男爵担任主席职务时就马诺河联盟进行的讨论；在内格罗托大使担任主席职务时就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进行的讨论，以及就安哥拉、阿富汗、东帝汶等问题进行的讨论。

关于实质性问题。报告明确地表明在报告所涉期间安理会的工作是多么繁忙。安理会不仅要对国际和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作出反应，而且要对影响区域与国际一级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安理会对九月十一日攻击事件和直接的恐怖主义攻击威胁作出了积极反应，通过了第1363(2001)、1368(2001)和1373(2001)号决议。同样，安理会也大量参与了解决阿富汗、科索沃、东帝汶、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安哥拉和布隆迪等问题。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安理会并没有能够以同样成功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例如关于中东问题，尽管安理会在2002年1月作出决定定期举行月度简报会，

从而迈出了一大步，但它并没有在协助和平进程方面取得实际进展。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对于某些会员国不遵守安理会决议的行为的默示宽容，也妨碍本机构取得所需要的成果。同样，安理会仍未能就制裁问题达成一致。

我们目睹了安理会在处理非洲问题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建立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我们的许多同事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以及富有成效地运用务虚会，极大地加强了安理会的作用。我同意科尔大使这样的看法，即关于其他复杂问题的特设工作组或许是十分有益的，可以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贡献。

安全理事会向各纠纷地区派出特派团，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安理会的工作中逐渐创造必要的信任气氛。我们认为，实地访问对于帮助各位成员了解和评估实地的局势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鼓励进行这些访问，这种访问对于介入当地冲突局势的当地行动者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尽管我们承认安理会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目标所作的努力，承认安理会成员对宪章各项原则的坚定承诺，但我们认为，集体利益不应该在国家利益的圣坛上作出牺牲。维护安理会中的团结应该是指导性原则，每个安理会成员都必须努力为此而奋斗。没有这种团结，安理会就很难呈现出一种可加以信赖和一致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就会给有关方面发出错误的信号。

在大多数情况下，安理会实践了它的标准，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这些都有助于安理会的可信性，使得这一机构更加透明和更负责任。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将成为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认真讨论和分析的目标，因为我们认为，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可以加强大会与安理会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增强安理会的可信度，并且更重要的是，维护安理会的中心地位。

坎宁安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指出，我同意围坐在议席四周的同事们的看法，即

这一年是取得相当大成就的一年。我们不仅实现了我们为自己规定的全部目标，我们还完成了相当大量的工作。这一年也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取得很大改进的一年，显示出了灵活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我们能够适应新的挑战和环境。

我们欢迎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安理会今年工作的报告。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该报告减少了篇幅，体例更加完善。我们赞赏马布巴尼大使及其同事努力完成了这份报告，我们对该报告表示支持。

这份报告反映出，在实现透明度与安理会开展有效工作之间的平衡方面取得了持续进展。至少在程序、非洲问题工作和纳入部队派遣国工作的新机制、以及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巴尔迪维索大使的委员会的基础工作三个不同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在我们担任主席期间，我们与新加坡代表团密切工作，针对已印发的关于安理会运作的程序说明制订了一个全面的索引。这个附带说明的清单为所有会员国清楚地说明了一系列程序上澄清的广泛问题。我们也赞赏挪威作为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努力为加强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对话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我们已经在解决人们所关切领域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我们欢迎部队派遣国在我们审议中表示的看法，视之为对安理会更好决策的贡献。

我愿指出，传统上对安理会缺乏透明度的指控正在很快地被各种事态所取代。关于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看到设立一个透明的机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这在许多方面消除了安理会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之间旧的分界线和区别。在第 1373 (2001) 号决议中，安理会从根本上对 9 月 11 日事件作出反应；这是一项全面的决议，让各国承担一系列立法和其它方面的义务。只有通过会员国以透明的方式分享信息，并且在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展开持续的对话，才能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一种把所有会员国纳入安全理事

会一项决议所产生的一个决策和执行进程的实际、全面和运作的方法。我认为，这也是安理会适应新情况的灵活性、创造性和能力的一个主要例子。

指出这一点之后，我们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审查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如说是计划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将充分支持今后提高透明度的努力，同时维持和改善安理会的效力。我们面前摆着紧急、重要和紧迫的问题：维持和平、预防冲突、打击恐怖主义、以及伊拉克所构成的独特的挑战。

我们作为一个理事会和作为安理会成员的责任促使我们继续努力做到坦诚和有效。比如，对于象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哈马斯、以及阿克萨烈士旅这样的自称的恐怖分子对和平所造成的威胁，我们应当直言不讳。在今后的几天里，将要求安理会遵循它之所以设立的宗旨，届时它将解决伊拉克的藐视态度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审议和通过提交给大会的 2001 年 6 月 16 日至 2002 年 7 月 31 日这个时期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草案。

我借此机会表示赞赏新加坡代表团，它在拟定安理会年度报告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报告的辩论，以及当时所作的评论终于摆在安理会面前了。我们为此感谢马布巴尼大使，他以其才干、经验、智慧和诚意来实现这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他的同事们的洞察力和承诺。下个月，我国代表团将荣幸地向大会提交该报告。我可以向马布巴尼大使保证，届时将大量地提到今天上午的讨论。我认为，提交之后，该报告终将使大会能够根据《宪章》第十五条承担其职责并发挥其作用。

目前的报告形式将使大会不仅能够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并予以注意，而且也能够真正地研究安全理事会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此外，让我也指出，在审议该报告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对该报告所载的创新内容表达自己的看法。

与其他同事，如纪梭·马布巴尼大使、让-达维德·莱维特大使、以及杰格迪什·孔朱尔大使一样，我将扼要谈一下制裁问题。我们极为重视改善制裁的执行情况以及精简制裁委员会的职能，这些都在我们的目标范围内。我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告草案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制裁问题工作组的相当艰难的工作。在我的主持下，该工作组已经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主要集中于2001年2月14日的一份题为“主席结论草案”的文件。这项工作使之能够取得某些进展。在程序问题以及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问题上，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该工作组已确认，各制裁委员会必须向联合国全体成员公布其决定，但可能阻碍执行制裁的时候例外。此时的主要分歧涉及制裁的持续时间。在这方面，障碍主要在于方法，而不是宗旨。某些代表团提倡有时限的制裁，而另一些代表团则支持没有时限的制裁，解除制裁取决于受制裁国家的表现。

工作组已最终就一个提高制裁效力和可行性，并限制制裁对第三国不良影响的加以改善的监测制度达成一致意见。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制裁工作小组取得的进展。应该理解，很快将作一次更加详细的通报，以便征求安理会成员对处理悬而未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的意见。

这些是我想在审议这份报告时所作的评论。最后，我要赞扬从1999年至2001年领导该工作小组的孟加拉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们为在这一时期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发言，因为我们审议以新格式编写的安理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哥伦比亚非常满意地参加了提出新格式并就此达成协议的行动，新加坡代表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这是进行评论的适当机会，以便为将成为由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审议的文件作出贡献，我们有义务向其他会员国陈述我们的行动。本着这一精神，我将提出一些想法。

新报告是否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一般来说，我可以断言，新报告反映了安理会的工作。然而，报告仍然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描述情况，列举了文件、公报、决议和问题等等，占用了报告的最大篇幅。我认识到，引言是朝正确方向跨出的非常积极的一步。在这里，我应该承认，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王国代表团对改革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进程显示了很大的支持。今后有必要加强这些努力。

正在审议的报告的有用性是什么？该报告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参考指南，大会会员国和从更加全球性的意义上说，国际社会据此能够批评性地观察安全理事会。该报告尽管尺寸小，但更具有吸引力，并且引起人们对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工作的必要关注。当然，事实是安理会的主要法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安理会对这些威胁作出的反应使人们能够评估安理会的表现。然而，目前格式的报告突出了这一重要的远见，鼓励更加知情地讨论，以及使安理会成员受到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建设性的检查。

修改报告值得吗？是的，完全值得。持续多月的改进报告的努力证明，改革过去看来不能改变的安理会的做法和惯例是可能的。这是对将来安理会成员的一个教训，适用于安理会工作中的其他做法。这是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教训，即在不造成难于或不可能控制的政治局势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可能的。最后，这是对秘书处的一个教训，秘书处一开始对这样一种安理会报告的可取性甚至可行性公开表示怀疑。

这对联合国会员国有什么好处？很难谈论修改的报告所带来的具体的、明显的好处。然而，一般来说，新格式是实现透明度的集体努力的具体迹象。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希望使大会更好地了解情况。这是承认两个机构之间存在政治连结点。这是一份关于两个机构互补性的报告。

我们是否应该理解改革报告的进程现在完成了？根本没有。该报告将提交我们所属的大会成员严格审查。根据它们的评论和建议，也许可能继续调整

报告的内容和组成。因此，这是一个制造符合联合国组织成员的要求的产品的永久进程。这也是一次完全符合根据秘书长本月初分发的报告（A/57/387）正在进行的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讨论的尝试。

我们还必须反映报告内容的方面。例如，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报告需要一个更加详细的关于特派团的章节——近几年来，特派团扩大了安全理事会在当地的存在——包括特派团存在的理由、费用、范围等等。这一问题在安理会外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充分地反映在报告中。

还有一些简单的但令人好奇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非常严格地解释正在使用的格式所造成的结果。例如，我指的是关于所授予的诺贝尔和平奖的章节——在第 21 章，也许在第 2 部分，英文本第 285 页——该章节说：“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或专家小组，无”。换言之，这一严格的格式造成可笑的情况，这是显而易见的。

下一步是什么？当然，下一步是认真听取在大会进行的辩论，以及非常积极地参加辩论。这一讨论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中一个方面是安全理事会的表现，换言之，对安理会的行动和不行动的纯粹政治审议。讨论的另一方面将涉及报告的特点。讨论将为我们在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提供指导方针。

说了这番话之后，我要评论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进行的讨论。所作的评论似乎非常有趣。由于我在会议的前半部分缺席，我试图阅读由新加坡代表团分发的马布巴尼大使发言的文本。象交换意见一样，本次自我批评会议非常有趣，这将产生安理会新的改革。

换言之，安理会必须尽力创造这种机会，而我们确实并未总是寻求这种机会，以批评我们自己并改善我们的工作。我们应当采取更多的这种行动并分析我们工作中的实质部分。评估安理会的表现是一个我们必须继续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马布巴尼大使的书面稿第 16 段中提到这一点。

然而，我谨指出，正如其议程中表明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要审议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报

告草案。这次会议不应成为关于安理会的议程和表现的某种总结。换言之，我们必须利用这次会议审议该报告草案，并召开其他会议来分析和评论安全理事会的表现及我们对他的评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科努津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积极地看待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定期年度报告草案。它提供了关于安理会在一年中的活动的详细情况。我们感谢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高度专业表现以及按期完成其工作。我们还感谢新加坡代表团对这一工作的贡献。

我们必须注意到安理会工作的有些无情的性质。我们在所审议的时期内，通过了 73 项决议和 45 份声明。公开会议的数目有所增加，更广泛地利用公开通报。这些都表明我们工作的透明度增加。

我们认为报告本身需要明确反映出安理会为改善其工作的方法所采取的具体步骤。还值得同意的是，该报告的紧缩幅度更大。主要的创新是报告导言一节中对安理会今年工作的分析性评估。同时，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决议更客观地表明了它的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保加利亚代表的身份谈几点简要的看法。

首先，我国代表团谨感谢秘书处草拟了报告草案，并感谢新加坡代表团推动了使报告更加简明和使各成员更容易使用的改进。我同前面的所有发言者一样，感谢马布巴尼大使和李部长。

迄今所进行的讨论是一种有益的对话——应当是“多方对话”——尽管象巴尔迪维索大使正确指出的那样，它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对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的分析，以及对其工作实质的讨论。由于这是这种讨论的第一次，这种两分法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和正常的。

我同意马布巴尼大使的说法，即安理会必须找到更经常开会的方法，以讨论其战略。秘书长所组织的年度务虚会是不够的。这是明显的，这次辩论提供了

额外的证据。此外，我顺便表示我们对莱维特大使很有创意的设想的支持，即在会议开始时散发的书面稿做成正式记录的一部分，而各代表团根据这些文稿推断。这只会提高和加强我们讨论的互动性质。

我必须指出，要对该年度报告提出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安理会的工作负荷大量增加。这只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正确指出的那样。全球化需要安理会作更好和更多的工作。这两个有些矛盾的必要性使我们在审议中所花费的时间以几何方式增长，常常在考验我们的实际限度，以让安理会更好地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进行交流，此外同国际关系中的其他行动者交流。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实际上，我在阅读报告时注意到，其中所缺乏的是对安理会和大会同非国家和非政府实体日益适当地享有的关系的陈述。随着全球化的开始，这种行动者的作用日益重要，我们必须加以考虑。

这方面需要进行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但这是整个联合国系统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安理会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工作。莱维特大使在这方面谈到了阿里亚斯方法会议。这是一种有益的模式，但它首先没有定期使用，其次它是不足的。

我要在安理会同各种行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方面提到的第2点，就是不仅同各会员国、而且同各区组织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西巴尔干地区的问题非常明显。安理会同包括愿意承担起其职责的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在内的区域组织建立了极其成功和有用的伙伴关系。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问题上，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伙伴关系，因为安理会为那些区域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法律和政治框架，这些组织的地面工作完全由安全理事会决议决定。

非洲是另外一个此种实例。安理会大部分时间——或许是60%至75%——被正确地用于处理各类非洲冲突。我们应该注意到，当地非洲伙伴的弱点意味着

安理会必须更努力地工作，我愿借此机会欢迎非洲联盟的建立。新建立的区域非洲组织成为安理会在处理过去各类非洲危机时的更为有效的伙伴非常重要。

谈到非洲问题，我愿就索马里讲几句。这里我完全同意挪威的斯特罗门大使的发言。关于索马里问题的制裁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主席已采取必要措施，恢复该沉静的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制裁和武器禁运只是安理会必须在有关该国问题上制订的全面战略的一部分，该国长期以来受到忽略。

最后我愿谈及个人所发挥的作用。格林斯托科大使谈到这一问题，我必须指出，我想到两个实例。第一个是莱维特大使在安理会向各大湖地区所派的代表团中发挥的决定性的实际作用。他的精力和决心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上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些光亮，在某些程度上这是因为他的决心。另一个实例许多人已经提到，即领导根据第1373(2001)号决议建立的委员会的格林斯托克大使所作的工作，其工作是透明度的样板。我完全同意在我前面发言的所有代表：联合王国代表团及其大使所树立的榜样的确值得安理会在其同会员国对话中遵循。

可以从这一份报告中得到两项结论。安理会每当团结一致时便非常有效。安理会成员意识到，保加利亚代表团为此团结不懈努力，因为没有团结便非常难以维持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和中心作用。这两个方面——团结和中心性——显然是相辅相成的，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责。

我是否可以认为经更正的报告草案得到安理会通过？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这项决定将反映在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份说明中，该说明将作为文件S/2002/1068印发。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其对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1时10分散会